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第一辑

1982

文史资料选辑

一九八二年第一辑

(总第三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二月



新四军在行进中



一九五九年上海市戏曲学校在北京演出《墙头马上》

受到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接见时留影

(左一)吴晗,(左二)郑传鉴饰裴行俭,(右二)周恩来,(右一)言慧珠饰李倩君。

另有俞振飞饰李少俊,华传浩饰裴福,梁谷音饰梅香未摄入。

鄒威丹先生遺象

鄒容像



劉三像

封面装帧 范一辛

文史资料选辑

1982年第一辑(总第三十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118,0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700

书号 11074·512 定价(六) 0.57元

内部发行

目 录

参加中共“六大”的回忆	丁基实(1)
新三团在皖南事变中突围作战经过	阙中一(10)
傅秋涛谈新一支队皖南突围	顾克如(29)
陈毅同志早年的一篇遗文	文 操(35)
抗战时期山东的机要交通工作	任兆祥(39)
地下交通线续记	曹 达(54)
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	朱伯康(64)
孙中山与华侨	张持平(75)
先祖父邹容事迹杂忆	邹传德、邹传参(86)
刘三先生传	马叙伦 遗著(103)
回忆父亲刘三轶事	刘 绣(105)
参加审理刺杀宋教仁案追忆	江公亮(107)
记动力安装工程师施子京	恽 震、袁丕烈(109)
大夏大学校史纪要	欧元怀 遗著(114)
许广平谈鲁迅的日常生活	姜坎庐、穆 俊(139)
我所知道的世界书局与世界社	李清悚(144)
六十年来的南昆	严庆基(150)
雷允上中药店与六神丸	商一仁(161)

参加中共“六大”的回忆

丁 基 实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我作为山东代表团团长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时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残酷屠杀、镇压,祖国大地一片白色恐怖,在国内简直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安全开会的地方,因此经第三国际决定,党的“六大”到莫斯科召开,同时也便于第三国际了解中国党的情况,并进行指导。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必要的。

一、山东代表团的产生和赴苏经过

一九二八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接到党中央通知,要山东省委选派代表三人(其中团长一人、团员二人)于四月底到上海与中央接头,准备出发赴莫斯科参加“六大”。因当时反共力量异常嚣张,密探、特务、叛徒到处横行,山东环境也十分险恶,只能召开人数较少的省委扩大会议,讨论“六大”代表人选问题。于是由省委代理书记傅书堂(铁路工人、高密县人)在济南召开了党团联席会议。这时省委书记卢福坦已调中央工作。我记得代表团人选方案是由共青团省委书记顾作霖(上海嘉定县人)提出,经过讨论最后通过的。推选丁君羊(现名丁基实)为代表团团长,团员两人,一位是淄

博矿区的里工(里工是井上作业的机器工人),一位是青年农民,分别代表山东工人、农民和青年,青年农民的名字叫王科仁,工人的名字我忘记了。记得这位青年农民代表曾参加过中央领导的镇压叛徒王福元的斗争,打死了王福元,后来他被叛徒王用章(王福元的哥哥)杀害了。

我们这个三人代表团是在一九二八年“五三惨案”后出发的。出发前,规定沿途我与他俩佯装成不相识样子,他俩则作为叔侄关系,有人问起,只说是因山东闹灾,生活困难,去东北找那个青年农民的“下关东”的父亲的。我们到上海后,与中央负责联络的周恩来同志直接接头。周恩来同志向我们交代了途中应注意的事项和到达哈尔滨以后的接头地址,并发给了旅费。然后,我们就从上海搭乘日轮榊丸号去大连。

到大连下船以后,因人地生疏,我曾去看望我在青岛读小学时的老师李仲刚先生。他是老同盟会员,国共合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当时他在大连日本人政府里当翻译。我去时他正好在家,他知道我是共产党员,一见面,就露出十分惊慌的神色,对我说,本来应该请我吃一顿饭的,但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说最近将有大批共产党员经过大连,车站、港口检查很严。

我得知这一情况后,没敢在大连耽搁,就由李先生伴送到车站买了票,三人上火车走了。在上海临行时,中央没有交代路上发生情况与中央联系的办法,又急于脱离险境,所以,没能把日本人发现共产党员在大连过境的情报通知任何人。在列车上,我们发现宪警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象猎狗一样搜查旅客的行李包裹,认为有什么地方可疑,就要打开检查,想从中捞点什么,以便抓人。因为我们的行李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能引起他们怀疑的,就安全地过去

了。到长春以后，换乘中东路火车到达哈尔滨。

在哈尔滨，我们按规定地点去接头，领到了三张去满洲里的火车票。同时，接头人还向我们交代了到满洲里下车后雇车和出国境的暗号。我们很快到了满洲里（当时是中苏边境的一个小火车站），下车后，走出站外，有几辆苏联人赶的马车在兜揽生意。我们看见一辆马车上插着两只长长的鸡毛掸子，这就是规定的暗号。我们假装上去讲价钱，立即乘上了这辆马车。赶车的苏联人赶着马车向西北方向走了二、三十分钟，到了靠近中苏边界的一座小石桥。桥边上有我国边防哨兵，问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回答说，到“广新公司”。广新公司是个煤矿，到该公司要经过此桥，这是哈尔滨接头人交代我们这样说的。马车过桥以后，向前走了一百多米，向右一拐，过了一条无水的小浅沟，就越出了国境线。赶车人加鞭打马，向北狂奔四十多米，对面走来一位红军边防士兵，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哨所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岗亭，我们在这里休息了个把钟头，并吃了一点红军士兵为我们准备的东西。随后，红军哨兵带我们向东北方向前进，走了五、六里路，到了一个小火车站，换乘去莫斯科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

当时苏联处在经济恢复时期，生活很艰苦。车上每人有一个铺位睡觉，但供应的饭食只是高粱、玉米掺在一起做的干饭。火车开始顺着原始森林前进，一路林木参天，十分壮丽。过了赤塔以后，火车沿着贝加尔湖东、南、西三边走了约一天时间。贝加尔湖盛产肥美的鱼，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尝到了俄国式烘烤的熏鱼。在寂寞单调的贝加尔湖边，面对茫茫北海（贝加尔湖古称北海），不免流露眷恋祖国之情，不禁想起了汉朝的苏武——这就是当年苏武牧羊的地方啊！由于当时苏联工业刚刚恢复，严重缺煤，火车头

的锅炉烧的是木柴，行驶缓慢，每小时不过走三十公里左右。从满洲里到莫斯科，单乘火车就用了约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到达莫斯科已是六月份，天气已经不冷了。

为了保密，防止间谍刺探“六大”开会的情报，我们在莫斯科没有停留，就径直向莫斯科近郊秘密开会的地址——塞列布若耶进发。这是靠近兹维尼采罗镇不远的一幢乡间别墅，也叫“银色别墅”。从莫斯科到这幢别墅，沿途都是森林，别墅就在树林里，附近还有几幢小房子。别墅是二层楼建筑，楼下餐厅可容纳七、八十人开会，楼上有客厅、卧室，是一座相当古旧的别墅，一切布置并不华丽。大房间住男代表，小房间住女代表和工作人员。我记得我爱人于培真与邓颖超同志住在一起。

二、“六大”开会情况

中共中央为了开好“六大”，曾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秘密选派部分男女学生担任大会的秘书工作，我的爱人于培真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王兰英、李培芝、杜作祥、孟庆树、秦受云（以上是女学生）、瞿景白、胡锡奎、郑子瑜（以上是男学生）等。原在中山大学任翻译的庄东晓、潘嘉辰也在大会做翻译工作，王明原是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翻译，在布哈林讲话时担任翻译。翻译等工作人员，包括王明在内，都不是“六大”代表。

大会正式代表六、七十人，除各代表团成员外，八·七会议以后的中央领导人，有的也参加“六大”，是正式代表。关于出席“六大”的代表，有些党史资料说法不一，现在我将能回忆起来的名字开列如下：张昆弟、周恩来、周秀珠（女）、瞿秋白、何叔衡、向忠发、

项英、徐锡根、华少锋、黄平、关向应、李立三、李子芬、罗登贤、苏兆徵、丁君羊、王仲仪、邓颖超(女)、王若飞、温玉成、蔡畅(女)、杨殷、袁炳辉、杨之华(女)、王懋庭、谢觉哉、徐特立、刘伯庄、夏曦。这个名单不是全部,有些省区的代表耽搁在路上,未能出席。此外,还有两个忘了名字的山东代表,辽宁的一位工人代表,大家开玩笑叫他“张作霖”,另外一位南方代表发言时为陈独秀叫屈,名字也忘记了。有人说张国焘、邓中夏、蔡和森是代表,这几个人我都认识,当时没有见到他们。

“六大”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开始,至七月十一日结束,共计开了二十四天。大会由瞿秋白主持开幕,第三国际派布哈林出席指导,他经常到会,多次讲话。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国共分裂后的国内形势和今后党的任务”。布哈林在一次讲话中分析中国的革命形势说:中国革命正处在好比两个山峰的峡谷地带,是个暂时的低潮时期,但新的革命高潮不久就会到来。布哈林的意见在代表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以李立三、瞿秋白为主的一些人认为蒋介石的统治是不稳固的,内战不断发生,革命高潮很快就会到来。但以山西代表王仲仪(他发言很积极)为首的一些人认为蒋介石的统治会稳定一个时期,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这是两种对立的意见。前者主张井冈山的武装力量,应采取向外发展的进攻战略,以期建立较大地区的割据形势,与全国各地暴动相呼应。后者主张蒋介石的军事力量还较强大,革命高潮不会很快到来,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积蓄力量,以备应付革命高潮到来后的局面。我在会上代表山东代表团也发表了意见,认为照山东的形势看,要想较快地组织武装暴动的可能性不大,但也不主张慢慢来的策略。

除了上述主要争论以外，也有几位代表拥护陈独秀的主张。有一位代表(名字我忘记了)，个子不高，三十开外，瘦瘦的，象个中小学教员或店员，长脸尖下巴，皖南、江浙一带口音，他的发言，大为陈独秀叫屈。另外一位与他观点差不多的，是云南代表王懋庭，他很崇拜陈独秀，回国后很快加入了陈独秀一伙。

以刘仁静为首的托洛斯基派，虽然没有能进入会场，但他们知道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跃跃欲试，想趁机散布他们的主张。在大会闭幕后，紧接着召开共产国际“六大”时，刘仁静就曾混进会场，在代表中活动。

“六大”选举中央委员时，布哈林强调工人成份。山东代表团推选的中央委员是周恩来、李立三、瞿秋白、苏兆徵、项英、关向应、向忠发、卢福坦等。记得广东的女代表周秀珠自己说她是个“半无产阶级”(意思是她不是完全的产业工人)，引起过我的注意。后来，中央委员会选举向忠发为总书记，而没有选举领导过省港大罢工的工人领袖苏兆徵为总书记，由于我不是中央委员，不了解其中原因。其实向忠发是长江中摇小船的工人，不是近代产业工人。

三、中国共青团“五大”与共产国际“六大”

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以后，紧接着于七月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山东代表团那位青年农民代表参加了共青团“五大”。在这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上，选举关向应为团中央总书记，温玉成、李子芬、顾作霖、饶漱石等为团中央委员，其他成员的名字记不清了。

我与关向应较熟，一九二四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时，在陈为人家里开始认识他，一九二五年关向应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山东省委书记时，我们一起工作过。他是辽宁海城一带人，个子不高，长得很清秀。他是中共“六大”代表，会上发言不多，但他与中山大学搞秘书工作的学生很熟悉，在会场内较活跃，当时大家叫他“小关”。他很能联系群众。有人说他是莫斯科劳动大学初期的学生，不符合事实。我知道他二十岁左右时，在烟台织布厂当工人，认识陈为人，后经恽代英介绍参加了“S·Y”（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工作能力强，办事有条理，不管多忙，都能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加以处理。他个子矮小，看上去很年轻，我认为当时选择一位年轻干练的同志做团的工作，更有利于联系青年群众。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是七月十七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八月上旬结束。中共出席大会的，有“六大”的中央委员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瞿秋白、关向应等和各省代表团的团长。除苏联代表团外，以中国代表团和德国代表团人数最多，各有三十多人。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团都自带翻译。中国代表团的德文翻译是武兆镐，和我在同济大学同学，所以至今还记得。

共产国际“六大”德国代表团团长是台尔曼，这位德国工人领袖个儿长得很高，在一米九以上，在会上讲过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创始人蔡特金也出席了大会。当时这位老人已七十二岁了，不能走路，用担架抬上主席台与到会代表见面。德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李卜克内西的儿子，也是德共代表。

共产国际“六大”的主持人是布哈林。斯大林虽然也走上主席台与大家见面，但未讲话。对这次大会，布哈林与斯大林意见是否完全一致，没有具体表现出来。当时布哈林是共产国际的总书记，

他很会讲话，讲起来滔滔不绝，很生动，很有逻辑性。

这次共产国际“六大”会议上，托洛斯基分子活动很猖狂。经常出入中国代表团住处的，是中国托派骨干刘仁静。他积极散发托洛斯基提出的共产国际“六大”决议草案，企图影响代表，让代表接受托洛斯基的意见和主张。刘仁静曾塞给我一份决议草案，所以我至今印象较深。刘仁静回国后做了中国托派头头之一，据说原山东省委书记尹宽，在大革命失败后也加入了托派。

四、回国经过

共产国际“六大”闭幕以后，山东代表团决定回国。回国前在莫斯科停留了约两周，游览了莫斯科市区和近郊的一些地方。那时莫斯科的街道不整洁，商店里东西极少，我们仅在一家小的中国饭馆里吃过一次中国饭。那时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态度很友好，彼此见面，非常亲切。

我们回国的路线与去时不同，走的是东线，从莫斯科经赤塔到海参崴，然后转向西南到绥芬河（旧称五站）偷越国境，乘火车到哈尔滨。

我们到了海参崴后，住在满是树林的一座旧别墅里，等了约两三个星期，不准随意外出，但在这里有中国饭菜吃。出发时间确定以后，先乘火车到绥芬河，这是一个边境小站，我们在一间小房里住了一天，第二天晚上，有一位苏联向导领着我们爬山越岭，穿过莽草丛生的山林，天快亮时才越过了边界，躲在边界线的中国境内。小火车站站台前面，为铺铁轨，筑起约二、三米高的路基，我们就躲在路基下边，由苏联向导到车站替我们买了车票，分给大家。

等火车开行前两三分钟，大家奔出来爬上火车。我们穿着不中不西的各式服装，路警一时搞不清是哪里来的旅客，火车就要开动，只好让我们上去，无法检查留难。

火车走了一整天时间，到了哈尔滨，各自找投宿住处。我这次是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爱人于培真一起回国的。

我们从哈尔滨到大连，再由大连乘轮船到青岛。到青岛已是十月末，当时中共青岛市委书记是吴湖景，我向他介绍了“六大”的情况，即回济南向省委汇报。当时中共山东省委出了叛徒王福元、王用章兄弟俩，工作受到极大挫折，中央和山东省委正忙于同叛徒“二王”作斗争，以致“六大”的决议、路线在山东没有得到全面贯彻。

以上这段史实距今已半个多世纪。我今年八十岁，有些情况记忆不清，所想起的也只限于个人的经历，欠准确之处，希望知情者指出。

(政协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供稿
张以谦、卿黎整理)

新三团在皖南事变中突围作战经过

阙 中 一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皖南新四军部队为了团结抗战，委屈求全，顾全大局，奉命北移，我新三团是中路的前卫团。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

(一) 北 移 路 线

(1) 北移前皖南新四军部队分布情况

北移前皖南新四军部队驻地情况大致是：军部和直属机关驻云岭和云岭一带，军教导总队驻中村和中村一带，军特务团驻章家渡附近。新一支队和老一团、新一团驻土塘、杨村、汀潭、左坑一带。新二支队和老三团驻北贡里和北贡里附近一带，新三团驻南陵县的何家湾、牙山和铜陵县的叶家村一带。新三支队和五团驻繁昌地区的中分徐、三条冲、梅冲等地。

(2) 中央指示的北移路线及其有利条件

中央早已指示皖南新四军的北移路线是：在铜陵、繁昌地区之间过长江，去江北无为地区；或经宣城到苏南，过长江到苏北地区。中央所指示的路线是正确的，如经上述路线北移，对我极为有利。